

牛致功 著

唐代的史學與通鑑

史通卷第一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
文迥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
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
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
列之於後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

牛致功 著

唐代的生字与通鉴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

牛致功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94 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7-5613-0219-3

K·20 定价: 3.30 元

前 言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即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后来，又逐步开始兼搞一点古代史的研究。由于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需要，必须经常接触古代的史籍，这样一来，就使我对古籍本身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促使我又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史学史论著的论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没有学过史学史，不知道史学史应该讲些什么内容，读了一些有关的论著以后，才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也发生了兴趣。所以，60年代初，系领导要我准备开中国史学史课的时候，我就欣然同意了。后来，由于下放劳动，改变了我的计划。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十分好笑，一个刚过而立之年，大学毕业不久，根本没有系统学过史学史的人，怎敢答应接受开中国史学史课的任务呢？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啊！80年代中期，历史系领导非常重视史学史，有人鼓励我开这门课，我倒不敢答应了。因为这时深知自己这方面的知识极为浅薄，如果勉强开课，会被学生哄下讲台的。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学然后知不足了。

尽管我不敢开中国史学史的课，但对这方面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在学习别人有关论著的过程中，逐步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好象也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在我看来，以往的史

学史论著中，关于古代史籍的介绍，史学家的修撰活动，史官制度的演变等等，都有很好的成就，但对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历史观，特别是史学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与整个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等等，都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辈们的贡献太少，而主要是人们的活动不能超出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发挥广泛而深刻的作用，是从50年代初期才开始的。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的学者，要他去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当然是不现实的。

根据以上认识，我很想在这方面下点功夫。60年代，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但是，我的主要任务是中国古代史的教学，80年代初，又到唐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始终没有机会专门学习与研究史学史。所以，到现在为止，对史学史来说，我还没有入门，只不过是业余爱好者而已。

进行唐史研究，必然要阅读有关史籍。同时，我还有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仅自己读书不行，还必须向研究生介绍有关史籍。这样一来，就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阅读上，还必须对史籍进行一些研究。于是，这又和我对史学史的兴联系在一起了。近几年来，先后撰写的《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资治通鉴〉与隋唐史研究》、《刘肃与〈大唐新语〉》等，就是任务的需要与兴趣爱好相结合的产物。

在对另一些史籍的研究中，又发现各种史籍往往不是孤立的，互相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例如，在读唐初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时候，发现这些史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前到后有着必然的发展过程。为了认识这个过

程，我先后写了《魏征的史学地位》（见《隋唐人物述评》）、《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唐代史学家的经济观》等篇。再如，在认识到司马光撰《通鉴》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给宋朝皇帝提供借鉴的时候，又发现司马光不是鉴戒史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是唐代史学家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在这里受到启发，我才写了《唐代的史学与〈通鉴〉》。我是孤陋寡闻的人，现在的学术刊物很多，有关论文以及众多的出版社所出版的各种专著，有很多我还未曾看到。所以，我只能这样说：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把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从学术思想和编撰体例等各方面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是拙作的新意所在。

我这本小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其一，论述了几个尚未被人注意或被人注意不够的史学家及其对史学的贡献。唐代的史学较前有很大的发展，史学家与史学著作很多。几位著名的史学家，象刘知几、杜佑等，早已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史通》、《通典》的研究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在有关的史学专著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还有一些史学家及其史学著作，尚未被人们注意，也更谈不上什么研究。象温大雅及其《大唐创业起居注》、刘肃及其《大唐新语》，还有许敬宗、韦述、柳芳等，在一般史学史教材中都是很少论及或者根本没有提到的。即使象魏征那样的史学家，虽然其政治地位已是妇孺皆知，但其史学地位也还缺乏充分的估计。因此，我对这些史学家都作了必要的介绍与评论，他们对史学的贡献及其史学著作，也有力所能及的探索。在这方面，即使起不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但我的良好愿望也会使拙作充当引玉之砖的角色。

其二，对于少数众所周知的史学家及其著作进行了一个方面的重点研究。也就是说，别人已有研究的地方，我不再重复，仅从别人少有涉及的薄弱环节，进行了至少是有新角度的研究。例如，刘知几与《史通》、司马光与《通鉴》，有关的论著非常之多，要做一般的评介或综合论述，已无任何必要，所以，我仅写了《刘知几的修史主张》、《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看〈资治通鉴〉的中心思想》等，自己有所见解的几篇。如果说这样重点深入的办法，能为史学名著的深入研究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认识唐代史学与《通鉴》的关系，也就符合我的主观愿望了。

其三，力图说明唐代史学在古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古代史学的发展，到了唐代，从史学思想上是由相信天命到重视人的作用。唐统治者不再相信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而是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寻找借鉴以巩固其统治地位。这种思想的继续发展，就成为司马光修撰《通鉴》的思想基础。从编撰体例上是由断代史向通史的发展。自《汉书》以后，断代史日益增多，唐统治者迫切需要通史的知识，于是，《南史》、《北史》、《史通》、《通典》等，带有通史意义的史著陆续问世，为《通鉴》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修史制度方面，因为唐代的修史制度日益健全，逐步形成了完备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等历史文献，为《通鉴》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资料。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说明唐代史学在古代史学发展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史学发展史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自己认为是本书的创见所在，因此，定本书之名为《唐代的史学与〈通鉴〉》。

唐代史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学力所限，我在摸索前进中

的一点收获体会，距离对唐代史学的全面深入研究还差距甚大，况且，还想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或者有所创新。这种艰巨的任务与主观条件不足的矛盾，必然会使人想到这本小书的成就只能是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初步尝试。事实正是如此，我写的这点东西，好象乘着刚离岸的一条小舟，正向海中驶去，看到茫茫无际的大海，大大开阔了视野。由于心情激动，想把经过的一段短短航程上的所见所闻，向岸上的友人报告，故而写了这篇见闻录。换句话说，在唐代史学研究的道路上还任重道远。

当前，我的主要任务还是唐史研究，我从唐史研究中，认识到唐史与中国通史的关系非常密切。唐史研究的深入与提高，必然丰富通史的内容，提高通史的质量。相反，通史内容的丰富与质量的提高，也必然有助于认识唐史在通史中的地位，同时也有助于认识唐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及宋辽金元史的相互关系。二者是互相促进的。从这里受到启发，我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教材性的通史上，也应该使分段研究与系统研究结合起来。目前，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与教材已经不少了，急需深入与提高。这就需要重点深入，加强分段研究，象古代史的研究那样，不断出版一些有质量的断代史学史。只有这样，若干年后，才可能有更高质量的中国史学史问世。否则，类似的书出版再多，也只能是大同小异。即使作者的情况不同，各有特点，也很难有大的突破。

一个未入门的业余爱好者，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说了以上无关宏旨的话，也许是画蛇添足，毫无必要。但是，一个排球运动的爱好者，在为我国女排健将的大显身手而鼓掌的时候，外加几句评论，也是出于良好的愿望，运动员也不会

对这样的观众表示反感的。如果这个比喻不错，我就不是班门弄斧了。

这本小书的出版，是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有关同志的鼓励和支持分不开的，在此谨致谢意。

1988年最后一天下午6时

目 录

前言.....	(1)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	(1)
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	(29)
唐代史学家的经济观	(48)
唐代的史学与政治	(67)
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	(97)
唐初杰出的史学家令狐德棻	(114)
关于唐太宗篡改《实录》的问题	(131)
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	(146)
刘知几的修史主张	(159)
有功于唐代史学的韦述	(181)
柳芳及其史学	(189)
刘肃与《大唐新语》	(205)
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看《资治通 鉴》的中心思想	(225)
《资治通鉴》与隋唐史研究	(251)
从范祖禹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看《唐鉴》与 《通鉴》的异同	(273)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似乎毫不相关，但认真深入研究一下，不管从史学思想上，资料与编撰体例上，二者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以为，《通鉴》是唐代史学继续发展的产物。没有唐代史学打下的基础，司马光是难以有《通鉴》那样的不朽巨著的。

从史学思想上唐代史学 与《通鉴》一脉相承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修成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原来是一部书，称为《五代史》。这就是后来的《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五代史》的修撰者虽然分别为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和魏征，但总负责的是魏征。魏征不仅组织领导了修撰工作，同时还亲自撰写了梁、陈、齐、周诸史的总论与《隋书》的序、论。这样一来，《五代史》中就充分反映了魏征的史学思想。

魏征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的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反映。魏征在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他千

方百计地为唐太宗出谋划策，甚至犯颜直谏，为巩固唐太宗政权而尽心竭力。为了同一目的，他又通过修史，从历史上为唐太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遗余力地为唐太宗寻找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历史借鉴。二者虽然殊途同归，但毕竟各有其不同的内容。

魏征史学思想的特点，就是他认为历代王朝的兴衰，其根本原因在统治者本身。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需要乞求天的恩赐，也不能依靠别人；必须自己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才能有所收效。正因为如此，魏征的史学思想在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起了转折点的作用。

两汉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思想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史学领域中，各种史籍的内容都有明显的反映。例如，班固在《汉书》中编造了一套自尧、舜以至夏、商、周、秦的刘氏世系，从而得出结论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①显然这是说，秦的灭亡，汉的建立，是天的安排。

西晋时，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也同样宣扬这种观点。因为曹操是谯(安徽亳县)人，所以，关于曹丕即将代汉的情况，陈寿写道：“初，汉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以此预示“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45年后，果然又一次“黄龙见谯”^②，当然这就意味着火德

⑧

①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②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汉)当灾，土德(魏)当兴于淮。在汉亡前45年，天就预告人们，曹氏将要代汉取而代之。可见曹氏代汉是顺乎天意的。至于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如汉魏故事”，也是由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①。西晋初年的史学家，用这种天人感应说来论证西晋统治者的地位的合理性，无疑是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后来的《后汉书》、《宋书》、《魏书》等等，无不充满着这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可以说说明统治者取得地位是合乎天意的，但同时又说明失去地位也不是人为的。由此可见，抛开人的作用，空谈天命的理论，仅只能消极地说明广大人民应当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并不能起到积极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的作用。

魏征在负责修撰《五代史》的时候，抛开了这种消极思想，否定了天的作用，主张千方百计地发挥人的能动性，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魏征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北齐的灭亡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齐后主前后，齐国的地理条件没有变化，太行山、长城、长江、淮水都依然如故，甚至国家的赋税收入，军队的多少都是原样，但为什么“前王用之而有余，后主守之而不足”呢？主要原因是“前王……沐雨栉风，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赏必罚，安而利之，既与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后主则不然，以人从欲，损物益己。”挥霍无度，骄奢淫逸。“土木之功不息，嫔嬙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殫，物产无以给其

^①《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

求，江海不能瞻其欲。”因此，导致了“土崩瓦解，众叛亲离”^①。同样的客观条件，国家有兴有亡的差别，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同的人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在论及陈朝的灭亡时也是如此。他认为陈后主不象陈高祖那样，“拔起垅亩，有雄桀之姿”，而是“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根本“不知稼穡艰难”^②，因而他堕落腐化，导致了政治的腐败。关于隋朝的灭亡，魏征也是从隋文帝、隋炀帝身上去找原因。由此可见，北齐、陈、隋等王朝的灭亡，尽管其具体情况不同，但共同之处是统治者本身造成的，不是天的作用。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既然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关键在于统治者本身，那就只有从历代统治者的活动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才能巩固当代统治者的地位。在《五代史》中反映的魏征的这种史学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一样，完全迎合了唐太宗的政治需要。

从政治上总结历代统治者兴亡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③是西周统治者的观点。刘邦即位以后，听了陆贾总结了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历史经验，认为非常重要，立即就要陆贾为他编撰“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④被刘邦大加称赞的《新语》，就是这种政治要求

① 《北齐书》卷八，《总论》。

② 《陈书》卷六，《总论》。

③ 《诗经·大雅·荡》。

④ 《史记》卷九十七，《陆贾传》。

的产物。张释之也是因为“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①”，而使汉文帝非常满意的。唐朝的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唐朝初年，李渊就非常注意总结秦、隋灭亡的教训与汉、唐兴盛的经验。他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隋期末年，“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因而他就“拨乱反正”，虚心听取意见，致使君臣合作，政权巩固。唐太宗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是人所共知。他不断与大臣们讨论“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的原因，故而深知“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所以，他把大臣们当作“耳目股肱”，希望君臣“协力同心”^②，治理好国家。不难看出，由于统治者的亲身感受，直接从政治上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由来已久了。然而，通过撰写史书，间接为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寻找借鉴，则是从唐初开始的。如果把这称为鉴戒史学，那么，魏征总负责的《五代史》就是鉴戒史学的开端。

稍晚于《五代史》的《晋书》，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撰写了史论，就是因为西晋是统一的、短暂的王朝，“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于是，他就“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③他批评司马氏“前忠而后乱”，“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④”，

①《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传》。

②《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③《晋书·出版说明》。

④《晋书》卷一，《宣帝纪论》。

正是借古喻今，告诫臣下不要象司马氏那样，颠覆李氏政权。

唐太宗对晋武帝的评论，也正是唐初政治家的观点。他说，晋武帝初期，“敷化导民，以佚待劳，以治易乱。绝缣纶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侈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但由于他“不知处广以思狭”，“居治而忘危”，所以没有采取长治久安之策，致使“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①显然这是告诫他的子孙们，统治者要有长远的政治眼光，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治”，必须预见到“治”可以转化为“乱”。统治者必须千方百计地防止这种转化，否则就会象西晋那样很快灭亡。

唐太宗这种间接的寻找历史借鉴的思想，与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完全一致。他与魏征讨论政事时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就是说，皇帝的地位不是永远牢固的，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魏征还进一步分析了皇帝的地位不能永固的原因。他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②唐太宗批评晋武帝“居治而忘危”，魏征认为“居安忘危”是所有亡国之君的共同特征。他们这种政治观点与史学思想的完全一致，正是鉴戒史学的鲜明特点。

《贞观政要》虽非史学专著，但《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列入《史部·杂史类》，也算唐代史籍的组成部分。本来，

①《晋书》卷三，《武帝纪论》。

②《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吴兢撰《贞观政要》是因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为了使后来的统治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①以成更大功业，所以，戈直在序中说：“《贞观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不过，就该书的内容而论，涉及范围很广。唐太宗君臣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上自五帝、三王，下至隋炀帝，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内容，无不有所涉及。因此，该书的内容是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把总结的经验教训落实在贞观年间的政治上。换言之，贞观之治，是唐太宗统治集团在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适应历史前进的措施而形成的。正因如此，《贞观政要》的内容，不仅“唐世子孙……书之屏帷，铭之几案，”而且“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②由此可见，《贞观政要》是一本充分发挥了作用的鉴戒史学著作。

《通典》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其作者杜佑（735—812）历经唐代的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也就是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的动荡时期。他从18岁起就以父荫为济南参军，后又历任工部、金部郎中，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又至检校礼部尚书、淮南节度使、宰相等职。既然他出入将相，长期作官，当然要为维护唐朝统治者的地位而费尽心机。他编撰《通典》，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他在《献通典表》中说：“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素

①吴兢：《贞观政要序》。

②戈直：《贞观政要序》。